嘉绒·文化专列

丹巴《十二月杯子酒》

■ 陈康清

丹巴的《十二月杯子酒》别具匠新，独竖一帜；是五万多丹巴儿女耳熟能详的古老格调之一，饱涵了历经百年沧桑的岩边儿女的情义缠绵和可贵的爱情观。

十二月杯子酒是传唱在小金河流域三岔沟地区继啦啦调后的地方民歌之一。相传，一位张家的幺哥和李家的贤妹情投意合，冲破封建婚俗桎梏，以敢爱、敢恨谱写的一曲爱情之歌。明晰的反映了当时三岔沟地区的劳动人民的婚嫁风俗，十二月杯子酒的传唱具有深邃的历史性。

木匠张幺哥和李贤妹有情在心中萌芽，一月天，幺哥和贤妹不期而遇，由于情窦初开，贤妹借斟青稞酒给幺哥，搭话问幺哥的生辰八字。目的是为了与朝思暮想的幺哥八字相合，当地人称“取八字”或“合八字”，就是把两个相爱的男女的出生年月一同拿到“八字先生”处，让先生“合”。如果“相克”就不能结婚，反之则可结百年好合，这一婚俗一直延传今日。这一过程并不单一，盐、茶、米、豆，烟、酒、肉、红(六尺)缺一不可，如此一来，便留下了“一月杯子酒给哥斟，妹问阿哥几时生，生郎生在元宵会，姐在元宵闹花灯”之唱词。幺哥和贤妹的结合是上天注定的，这就是“缘份”。可双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在情爱的驱使下，小情郎和小情妹瞒着父母私下“取了八字”，结果是门当户对。

二月天了，幺哥和贤妹度日如年，但情谊更浓，就像地里的莲花白一样，越裹越紧，就像灶上的大铧锅一样，越擦越亮。日久天长，情浓似火。幺哥和贤妹备了薄酒双杯请来哥嫂，希望哥嫂能为他俩在父母面前多多美言，答应这门亲事，终成眷属；他俩还表明决心，成家后，同甘苦共患难，恩恩爱爱的生活。如此一来便有了“二月杯子酒，酒双杯，上瞒老子下瞒娘，当天满杯请哥嫂，二人做事二人当”。在当地，如果双方的婚嫁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一年三节”是没有了，就是每年的五月端午节、八月十五和春节初二的三个节日里娶方向被娶方送上喜礼，而且“送节”(送喜礼)的人必须是经过先生指定的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中与二者相合的才行。这是三岔沟地区流传至今的古老婚娶风俗，送节是图个喜庆和吉祥。

阳春三月，幺哥和贤妹在没有锣鼓喧天、爆竹声声、红绸丈二(红色的布六尺)、三揖九扣(进三步作三揖，推三步作三揖，且要左三揖右三揖)的礼数而举办婚庆了。贤妹和幺哥选良辰吉日，在一处名叫望乡台的地方独自举行二人的婚典。这时贤妹为情郎斟满三杯青稞酒敬情哥，意为天作证，地显灵，我嫁情哥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从不言悔。因此便有了“三月杯子酒，望乡台，望乡台上摆张桌，摆张桌子摆把椅，我敬情郎酒三杯”的唱法。

四月天了，花儿开放，小两口幸福快乐的生活着，说说笑笑的进了院门，并以划拳比试，谁摘花，谁戴花，结果贤妹三拳都输了，摘花的是贤妹，戴花的也是贤妹，可见如今贤妹已不再是黄花大闺女，而是有家世的人了。两人卿卿我我的事只有两人知道，这就有了“四月杯子酒，进花园，一进花园划三拳，摘花娘娘戴花嫂，二人做事二人晓”。五月了，正当端午，幺哥要与朋友欢聚，贤妹怕情哥酒伤身，再三嘱咐幺哥少喝雄黄酒。因五月端阳，三岔沟的人都要喝以白酒兑雄黄和苍蒲的酒，并抹在脸上和头发上，以示驱邪散病。这就流下了“五月杯子酒，五端阳，雄黄兑酒抹脸上，劝郎少喝雄黄酒，酒醉探花误小郎”之唱词。

六月，正值三伏天，幺哥劳动回家，汗流浃背，躺在床上，贤妹轻取毛巾为幺哥擦汗，还替幺哥扇扇，如此就有了“六月杯子酒，汗蒸蒸，姐在牙床取手巾，轻取手巾抹把汗，花花的扇子扇两扇”的唱法。“牙床”是三岔沟一种古老的床具，又称“罗柜床”，具有睡觉和存粮两种功用。如今被赶时尚的藏床替代。勤劳的幺哥由于劳累过度，七月，幺哥身体不支，卧病在床，茶不思饭不香，一早贤妹为幺哥做好了饭劝他吃，可小哥没胃口，这便有了“七月杯子酒，七月半，姐劝情哥吃早饭，郎说多谢又多谢，姐说见慢又见慢”。“见慢”是别客气的意思。八月十五月儿圆家家户户都团圆，可谓是天上月圆人团圆。幺哥的身体越来越差，贤妹抱着情哥，时苦时甜，伸手抚摩着幺哥的脸庞，抚慰哥要保重身体，于是便有了“八月杯子酒，月照楼，小郎睡姐怀中，轻轻拍郎三巴掌，劝郎小心又小心”。贤妹和幺哥对爱情的忠贞看来，如今的朋友是无以伦比的了。

九月是收获的季节。贤妹用玉米酿出甘醇香甜的美酒，今年有幺哥分享，这酒便有了特殊的名称“杜康”。于是便有了“九月杯子酒，是是重阳，杜康造酒满缸香，去年造酒无人尝，今年造酒有人尝”。十月是小阳春。为了生计小郎准备外出做木工，贤妹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可又无能为力，这便有了“十月杯子酒，小阳春，小郎收拾要起身，贤妹苦口相劝，小郎不听半分毫”。十一月了，小郎走了，贤妹依依不舍，送幺哥上路，这就留下了“十一月杯子酒，送郎走，送郎送在大门口，手掰门框摇三摇，不知小郎走那方”。十二月，天寒地冻，贤妹恋哥早日归来。春节将到，漂泊流浪的人们都赶着与亲人团聚，就是长江水也流进了大海。苦盼的双眸望穿秋水。于是就有了“十二月杯子酒，望郎回，望郎望在桥当头，长江水流归大海，不知小郎几时回”。

《十二月杯子酒》中幺哥和贤妹的情爱也许不及当代花花世界里年轻小伙子和大姑娘的情史浪漫，但唱出了当时该地区男女青年为了真挚的爱和无暇的情，冲破封建枷锁走到一起。这就是爱的奉献，爱的真、爱的切、爱的深。

董祖信专栏 史学随笔

试探泸定古代史

泸定古代史

泸定县加郡乡安家湾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证明4000多年前泸定地区就有人类居住。1985年3月，在大渡河沈村河边出土战国时期巴蜀柳叶形虎纹铜剑。2012年4月，在泸定伞岗坪出土青铜剑、青铜戈、青铜镜、青铜箭头、青铜手镯等青铜器20件，另外还出土了陶器残片40余件。据有关专家分析，推断，这批文物的年代应为战国中、晚期。此前在泸定县的沈村、冷碛、德威等地也曾出土过类似的青铜器。沈村汉墓中的汉砖和汉瓦及沈边土司辖地内出土的西汉五铢钱等。这些文物用无声的语言，证实了泸定县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春秋。

沈村在商、周为笮国之都，秦为首任蜀郡太守张若所灭后，置笮都县。至汉代，受汉招抚而因之。这便是西汉文学大师司马相如对汉武帝所说的“(蜀西古道)秦时尚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大渡河两岸所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各种文物，印证了《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记》中所记武王伐纣，古梁州“庸、蜀、羌、旄、微、卢、彭、濮”等八个部族小国，都曾出兵中原，会师牧野，助武王伐纣的这段历史。有的小国还在作战中立了功，以后被封为诸侯国，与周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八个部族中的羌，就是西羌，即冯蕙峦诗：“唐筑三碉城(今汉源县三交坪)，西羌久不战。韦(韦皋)、李(李德裕)善筹边，名王供珍膳。笮马与牦牛，耕凿民风变。……”中所说的西羌；旄，就是旄牛夷，他们都在甘孜州。即《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说的旄牛种，其本部在折多山以西的木雅乡。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太史公又说：“夫神龙以前，吾不知已。”他的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应为万世之表率。他在《史记·周本记》中，摘引《尚书·牧誓》，一字不漏，足见其治学之严谨。应该说《史记》中所记每一人、每一事都无虚妄，我是深信不疑的。更何况二十五岁的太史公司马迁曾于元鼎六年，受汉武帝之命，作为汉朝的特使，“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今西昌)、笮(今泸定沈村)、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亲自到了沫水岸边的笮都沈村，园满完成了使命。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还对笮都、沫水、若水及西南夷地区的山川风物、民俗民情、文物古迹、历史人物等都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为《史记》中《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篇章的创作积累了详实可靠的材料，增加到可信赖的科学性的程度。

历史上的若水(雅砻江)和沫水(大渡河)一样，流经不同地段有不同的名称。《华阳国志》、《汉志》旄牛县：“鲜水(今雅砻江支流鲜水河)出徼外，南入若水(雅砻江)。”根据上述记载，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也就是在今甘孜州雅江一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记“(司马相如)西至沫水、若水”，自然是到了大渡河边的笮都(泸定沈村)，完成招抚任务后，再过溜索桥西行至若水，即今雅砻江边的雅江一带地方又招抚了那里的旄牛夷。回到朝廷报告汉武帝，武帝十分高兴(“还报天子，天子大说(通悦)”)。司马相如的行进路线是由长安出发，沿秦蜀古道至成都，再沿商、周时期羌旄助武王伐纣、出兵中原的行军路线，由成都西行，经汉嘉(今雅安)、严道(今荥经)、黎州(汉源)到沫水岸边的笮都(泸定沈村)。这条古道也是秦时首任蜀郡太守张若攻取笮国的行军路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至沫水、若水，南至……。”这段话中的方位是十分准确的。到了沫水后，无论往邛(今西昌)，往冉(今汶川)都不是西行。因邛在沫水笮都(泸定沈村)之南，冉在沫水笮都之北，所以我们认为司马相如“西至沫水、若水”，就是到甘孜州泸定县大渡河(沫水)边的沈村后，再西行至雅砻江(若水)边的雅江一带，除此之外都不是西行。这也算是对去年和丹叔老师未果讨论的一个了结吧。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文物古迹的证实，今天的泸定县在商、周时期，位于梁州(巴、蜀)之西。大渡河西岸为旄牛夷国东岸为笮都夷国。秦为首任蜀守张若所灭后，置笮都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太史公司马迁“奉使(由长安出发)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叙》)。回京复命后，不久，南越又反。“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乃以邛都(西昌)为越西郡，笮都(沈村)为沈黎郡……”(《史纪·司马相如列传》)。以上便是甘孜州泸定县的上古史和中古史。从西汉元鼎六年以后，则今《泸定县志》有详尽的记载，无需赘述。 (全文完)

龚伯勋专栏 炉边漫话·长河说古·西炉篇

尹昌衡西征

1911，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神州大地，地覆天翻，历史洪流冲击康藏。是时，赵尔丰被杀，傅嵩炑离边，经边的干员，没于大潮，整个康区一时军民无主。在四川首举义旗，杀赵尔丰，擒傅嵩炑，被革命民众推举为都督的尹昌衡，“乃命黄煦昌为炉边宣慰使，执行前清边务大臣事。”(见尹昌衡《西征纪略》)。

1

妄言“独立”的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国人指使之下，围攻入藏陆军，驱逐汉人，更调集大军，大举东侵；康区已“改土归流”的土司，乘机复辟，川边大乱。尹昌衡在《西征纪略》中就记述了当时康区的严峻形势：“巴塘、昌都已被重围，江卡、乍丫相继叛乱，德格震动，道坞拘守吏，里塘亦失守。顾复庆军溃，陈粮员死之；乡城大举出寇，直据河口。联战不休，炉东大震，寇至十余万，自拉萨以至炉城，寸土无宁。骎骎东向，国基且摇。警报飞驰，中外大震。”

形势如此严峻，炉边宣慰使黄煦昌只得向省上请兵。省里开会议了十多次，因兵饷无着，仍难决断。此时正在病中的尹昌衡，在与会各员的强求之下，扶杖与会。会上，炉边宣慰使黄煦昌历述危难，声泪俱下，众皆叹惋，乃议以第三师十一团朱森林驰援边藏，月饷五万两。身为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不愧是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将领，就在将作出这个决定之时，奋然而起，首先指出绵亘数千里的边藏，仅派出一个团的兵力驰援，无疑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不仅不能震慑大举集结的“夷军”，相反“出师不威”，必助长敌之气焰。他相继列数了以这点兵力驰援边藏的十个“不可”(在《西征纪略》中，这“十不可”之说，是：“此非所以靖边而治藏也。夫边藏亘数千里，一时战乱，今以一杯水救一车薪火，无济于事，徒益滋蔓，不可一；番夷利我初乱，不能出师，若复出师不威，逆心必大肆，且夷军大集，既不足以声慑，又不能以力服，变乱日盛，摇及国本，不可二；士卒初集，心志浮怯，昔之宿将练兵，犹多道亡，今骤闻苦役，势必内溃，不可三；军多饷乏，民力维艰，又有边事，民负益重，域内怨讟，政府失民，不可四；边藏驻军，五千有奇，今如枯朽，非其力弱，心无系也，又不以重望之将镇定其心，不及一月，边军尽溃，根据悉失，无以用武，不可五；边藏作战，素称艰阻，昔有储蓄，犹时困乏，今赤地清野，积粮灰烬，运输艰窘，军心厌苦，祸起莫测，不可六；向来拓边，官吏贪暴，脔为鱼肉，刀俎横施，李骏前车，又见民国，将不至仁，益生夷忿，民国德泽，终无以昭，不可七；得志边藏，犹获石田，赔饷费兵，徒事羁縻，政治不改，实利不拓，不可八；邻省闻惊，全国张惶，川省无重兵上将，一举不靖，则纷起者众，不有统一之策，徒施蚁附之术，终酿大乱，不可九；京师来电，异常惊惧，川举失策，一国震动，共和初建，稍纵即危，民气未固，骚扰环生，不可十。有此十失，举事宜重”)。接着，他问与会诸公有何“政见”，“当如之何？”众人不知如何回答。倾刻，都督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当此存亡一发，惟有昌衡亲征，足以去十失，而开十利。”(在《西征记略》中，尹氏列数的“十利”是：“川局已定，坐镇自易，立功报国，此其时也，一出大举，泰山压卵，主将亲临，势大名重，灭此燎原，可操必胜，大利一；诛赵擒傅，番逆已闻，能制所畏，畏必倍之，先声夺人，虚名慑敌，番羌纷怯，未敢当帅，一人振臂，千里帖耳，大利二；惟余病休，士气弛靡，主将安乐，谁不怀居，今余扶病，一雪国耻，懦立怠振，三军气壮，如复赵趄，虽杀无怨，兵如不出，即以将殉，大利三；主将扶病远征，为民除害，凡生斯土，无不兴奋，余初出险，则又劝民，人皆有国，孰敢吝输，兵饷之出，罗掘可图，大利四；边藏兵将，谓川弃我，功无赏矣，过则谁罚，茫茫无期，困死谁怜，今闻余出，有持无恐，得依为命，弛靡者慎，困乏者起，前之败卒，悉化劲旅，大利五；躬亲劳苦，士卒谁怨，食茶食纸，将兵共之，冒矢冒石，敢以身先，即使困乏，犹可坚持，脆弱之患，可以无虑，大利六；余心素仁，持体亦大，一介不敢，无辜免戮，尊崇佛教，深结恩信，使知皇汉，不似暴清，边藏不复矣，大利七；以余亲出，大政得专，拓地设治，乘隙即入，出以慎重，施以威严，一日得地，数世之利，大利八；邻军如来，余当为长，分配调遣，非余其谁，如不需助，阻之亦宜，军政出于一途，胜计决在千里，不致纷扰，以害边功，大利九；京师知川督亲出，其心必安，各省闻之皆恃，民国初成，犹能力制边远，胆壮气足，不致惊扰，民国立命，永以万年，大利十。)

谭凯 摄影作品选

五色海 第620期

学者论坛

让文化回复精神本性(三)

■ 梁江

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一样，文化也有生态问题。历经千百年的演变，它们与人的社会生活在冲突中已维系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简单地套用经济开发的手段去对待文化，很可能会出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所描述的强势文化挤兑弱势文化的场面。我想，人们大约不愿意看到浅层的流行文化蚕食了民俗文化民间文化，快餐文化乃至泡沫文化淹没了传统文化的结局。坚持科学发展观，文化也只能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这是文化生态的内在要求。

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根本目标在于满足人民文化生活中不断增长的诉求，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素质，铸就时代风尚，打造国家“软实力”。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当代中国文化一方面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必须面向世界，积极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充分体现时代精神。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痛感于西方的物欲横流与精神堕落，唯寄望复兴东方精神，以拯救人类精神文明的缺失。显然，现代化虽以科技为主导，“现代化”却肯定不等于“西方化”，这是头脑清醒的西方学者一再强调的。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时代谈论中国文化、谈论美学理想，谈论文化“软实力”，我想，前提是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和本体价值必须有清醒的、明确的认知。

文化产业不等于文化，它只是文化的局部。首要的是，让文化回归它的本体，回复它的精神本性。这样，依托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热土的文化和学术，才会有符合自身规律的健康发育和良性拓展。在当今，尊重文化的内在逻辑，让文化回归本体，就是对文化发展最好扶持。 (全文完)

周末·五色台历

康巴藏区旅游文化“日志”

■ 泽仁多吉

松赞干布的主要功绩有哪些？

松赞干布系纳日松赞之子，在吐蕃王朝世系中为第三十三代。在位期间，建宫室于拉萨布达拉山，先与尼泊尔公主联姻，后又与唐文成公主联姻，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唐朝封之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等。诸如此类的历史因素对佛教在吐蕃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松赞干布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他雄才大略，深谋远虑。在用政治和武力手段统一了青藏高原诸部落后，在吐蕃内部设官定制，划分军事和行政区域，制定法律，采用历法，统一度量衡。在祖国内部特别加强与汉族的密切关系，与文成公主的联姻使汉、藏两大民族成为甥舅关系而“合同为一家”。对外则与邻邦互相交往，大力吸取汉族及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和其它方面的经验，推动了吐蕃社会的发展，使吐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松赞干布的另一大功绩是创立了藏文。据藏文史书记载，松赞干布有感于内部发展和外部交往的迫切需要，派吞米·桑布扎等人赴印度留学。吞米·桑布扎学成回来后，根据藏语特点，参照梵文字母，创制了藏文，编写了文法、修辞书多部，对吐蕃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这样说，吐蕃文明的双重特点，就是从这一时代开始的。

吞米·桑布扎的最大功绩是什么？

吞米是氏族名，桑布扎义为西藏学者，是印度人对他的敬称。藏史称吞米·桑布扎为七良臣之一。松赞干布为了发展吐蕃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深感有必要创立一种正规和统一的文字。在他执政初期，曾经两次派留学生赴天竺(今印度)学习文字，但因旅途艰难、气候不适等缘故，未能如愿以偿。松赞干布不改初衷，最后派大臣吞米·阿鲁的儿子吞米·桑布扎前往天竺。吞米桑布扎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天竺后，拜精通声明(即音韵学)文字的大学者李瑾和拉日巴僧格为师，精研梵文和佛学，还学就了各类大乘佛经。学成后携带包括大乘佛经在内的多种书籍返回吐蕃。还藏后参照梵文元音和辅音字母，结合藏语声韵，首创藏文，并开始翻译佛经。

吞米·桑布扎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创立藏文，使藏民族“开眼”并步入文明社会，这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给雪域带来不尽的光明”。

如何评价赤松德赞在藏族历史上的作用？

八世纪中叶的赞普赤松德赞为赤德祖丹和金城公主之子，吐蕃王朝第三十八代王，也是吐蕃历史上著名的赞普。他幼年即位(公元755年)，上任后为了更好的实行集权统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戡定叛乱；下令统计赋税，写定清册；调整官职制度，撤换领兵将领，对所属各部族派设专职官吏常驻督理；增订法律，严明赏罚，旌表武功；对外实施强硬政策，动用武力，扩疆拓土，使吐蕃王朝步入最强盛的时期。他在位时，还十分重视佛教文化和后继人才的培养。曾迎请菩提萨陀来藏弘扬佛法。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莲花生大师的到来，给藏族人的宗教生活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彻底变化。他兴建了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从此以后，寺院拔地而起，很快遍及全藏，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加入僧尼的行列，寺院僧众与日俱增。赤松德赞还从印度、尼泊尔各地迎请了众多其他高僧大德和佛教学者，鼓励著书立说，培育翻译人才，大部分的梵文、巴利文和汉文的佛经被翻译抄写，许许多多的有关佛教的新理论也相继问世，内容涉及佛教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医学、天文历算以及艺术，为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史家将他与松赞干布和赤祖德赞并称为“祖孙三王”，亦与菩提萨陀和莲花生大师并称为“师君三尊”。

但是，由于赤松德赞长期穷兵黩武，连年征战不休，再加上建设规模宏大的寺庙，以至于财力物力耗损巨大，黎民百姓负担沉重，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在其去世后不久，暴发了大规模的贫民起义，到公元842年，终于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崩溃。